

齐鲁大学的历史资料及其研究

□ 鲁娜/陶飞亚

齐鲁大学是传教士在中国最早创办的教会大学之一,本文旨在介绍山东地区收藏的齐鲁大学的历史资料及其对齐鲁大学研究的意义,希望为学们的进一步研究抛砖引玉。

1 齐鲁大学是在山东各地逐步发展起来的,齐鲁的资料也主要流传在山东各地。这些资料大约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齐鲁大学的出版物;二是解放后关于齐鲁大学的回忆文章和资料;三是历史档案。

齐鲁大学的出版物,实际上包括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学校出版的书刊。其中包括了学术类的刊物如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齐大国学季刊》、《齐大季刊》、《齐鲁学报》、《赍善半月刊》及齐大社会历史学系编的《学史丛刊》,以及不属于齐大管理,但在齐大编辑出版的当时很有影响的《田家》杂志。学校出版物中,还有一些学生团体出版的期刊。如解放前的《齐大心声》、《齐大通讯》,解放后的《新齐大》等。另一部分是学校人员特别是教师们的研究著作,其中有美、英、加等外籍教师的,也有中国教师的著作。

解放后很长一个时期内,关于齐鲁大学的文章和回忆资料是相当少的,但在七十年代末以后,各地都开展了文史资料的收集工作,回忆和涉及齐鲁历史的文字逐渐多起来,省和市县的文史资料中时有关于齐鲁大学历史的文章。一些是齐鲁大学的校友回忆过去的经历,一些则是后人撰写的关于齐鲁大学的历史和人物。在这方面着力较多的是山东省文史资料和济南市文史资料的编辑者。这两种资料陆续发表了“九一八事变前的齐鲁大学”、“齐鲁大学的乡村教育运动”、“齐鲁大学的国家研究所”、“齐鲁大学医学院”等文章,作者一般都是以前齐鲁大学的毕业生。除了文史资料外,济南市编写的《解放前济南的学校》也有对齐鲁大学的比较详细的记载。另外,

近年来山东也可以见到台湾出版的《山东文献》,这一刊物登载了不少关于齐鲁大学的回忆文章。特别是杨懋春撰写了有较大篇幅的《齐鲁大学的历史》,虽然笔者的看法不一定相同,但这还是迄今有关齐鲁大学最系统的回忆文章。

不过,上述两类资料,总起来说数量不算多。齐鲁大学的资料大多散见于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医科大学等各校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曾经是齐鲁大学前身所在地的登州(登州文会馆)、潍坊(广文大学)市也还有一些零星材料。烟台和青岛是山东传教士活动的重要地点,许多齐鲁大学毕业生或者是当地人,或者在这些城市工作,因此也留下了一些资料。

和前两类相比,第三类历史档案,不仅是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而且数量上远远超过前两类。这些史料大致保存在三个机构。一是山东医科大学收藏了齐鲁大学医学院部分学生的资料,主要涉及解放前在齐鲁大学医学院读书,但毕业时已经是山东医学院学生的这部分人的材料,数量有数百卷之多。二是济南市档案馆,保存了齐鲁大学在济南解放后到建国初的少量材料,虽然总共只有几卷,但却是研究转变时期的教会大学的人事、思想、体制变化的重要资料。三是山东省档案馆,比较完整地收藏了齐鲁大学自广文大学以来,包括了齐鲁大学在济南,四川成都,杭州,福州等地各个时期的历史资料。按照山东省档案馆的整理和分类,这部分资料大约有3000多卷,按不同的内容又被分成五个部类,比较便于研究人员使用。但是每个目录的索引还不是很详细,不能完全反映出每卷的内容,查出某个研究专题的有关的材料,往往有“披沙拣金”之劳。

这三部分的材料,虽然数量上相差很大,保存的状况也不一样,但对于齐鲁大学历史的研究来说,都

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如齐鲁大学出版的著作、报刊杂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学校的学术风气、学术水平。特别是关于学生编辑的校刊，真实的反映了各个时期学生的思想动态，是研究社会生活对教会学校影响的第一手材料。由于战争和动乱，齐鲁大学多次搬迁，齐鲁的许多刊物已经流失，即使在档案中也很难以见。因此，山东省图书馆和山东各大学图书馆仅存的这些刊物就更显出其重要的意义。举个例子说明，《田家》杂志是中国基督教协会主办，在齐鲁大学编辑出版的一本结合时事、宗教与科学常识的通俗刊物，在抗战前后到解放前后一直拥有相当多的教会内外的读者，如此重要的刊物经过动乱后，在齐鲁大学档案中只有一册，但在山东大学的图书馆却保存了大致完整的《田家》杂志，这就填补了其它资料收藏中的一个空白。

解放后的回忆文章，虽然有些受到当时情况的局限，不能比较客观地来考察过去的教会学校，但它还是提供了一些当事人在学校中亲身经历的事情。如果把过去和现在同一类型的作者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联系起来分析，也必然会展示出不同时代的不同的历史信息，同时也丰富我们对过去事件的认识。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文章近年来比较多一些了，涉及的人和事也越来越广泛，但是其中有许多是非正式的出版物，只在地方上流传，非常容易散失，应当注意收集。

比较起来，历史档案一般来说还是最直接，最忠实地反映了历史。众所周知，齐鲁大学也许是所有教会大学中搬迁流动最多的学校了。最早是在山东沿海的蓬莱，其后文理学院搬到潍坊，医学院在济南，神学院在青州，直到1917年包括文理医神四个学院的齐鲁大学才在济南新校园安家落户。但抗战爆发后齐鲁大学迁往四川成都，抗战胜利后返回济南，不久因受战事影响文理学院迁杭州，医学院迁福州。在这不停的动荡中，资料必然受到很大的损失。所幸的是解放以后，齐鲁大学经院系调整，档案移交山东省档案馆，大批资料因此而得到很好的保护。其保存的最早的资料可以上溯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最晚的资料至院系调整前后，这是研究齐鲁大学，研究山东基督教教会最基本的参考资料。

2 以往对齐鲁大学的研究中，比较重要的著作是郭查理在五十年代受联合董事会委托撰写的

《山东基督教大学史》一书，在美国大学的博士论文中还有关于齐鲁大学早期历史的文章，卢茨教授在《中国基督教大学史》中也把齐鲁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这些著作为人们了解齐鲁大学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脉络，有些方面也有很精深的论述。不过，现在随着各种资料逐步开放，为我们具体深入地在中西文资料结合、海外资料与国内资料结合的基础上探讨齐鲁大学，乃至教会大学的各个方面提供了新的可能。

课程设置是研究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史学界很久以来一直对教会学校的课程内容缺乏一个具体的了解，因此难免影响到对教会教育的看法。就山东的状况来说，齐鲁大学的档案为探讨这个问题提供了线索。在档案中可以查找到从早期文会馆，潍县广文学校，青州神学堂和济南齐鲁大学各个时期的课程表。学校开设什么样的课程，不同的课程教学多少学期多少课时，教育的重点放在哪些学科，都有详细的记载，在二十到三十年代，有的还有教材的样本。课程设置反映了办学者的目标，但是办学者的主观意图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如果把这些课程表按时间顺序联系起来比照一下，例如，看一下与齐鲁大学有密切联系的登州文会馆和青州守善中学的两份课程表，就可以看出教会学校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流变中发展的步伐。文会馆时期，可以看成是教会大学正在萌芽的时期，早期传教士在开设课程时煞费苦心；为了让中国人了解外来的宗教，进而信仰这种宗教，就必须开设基督教神学课程。从更远大的目标看，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教会需要的、在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大量人才；同时为了要使学校在一直尊崇古圣先贤的山东社会立足，使学生能与封建士大夫接触而不被轻视，也必须把圣贤经传列入教材。另外，传教士毕竟来自当时科学发达的西方国家，他们知道科学的力量，也深悉由传教士来作西方新科学的“捐客”，充当西学传人的意义，所以西学在课程中有突出的地位。早期教会学校课程中神学、中学与西学近乎于三分天下，但是，时过境迁，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以后，民主与科学成为潮流，科学在教育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教会学校适应了各种变化的风气，新学在课程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青州守善中学的课表是民国初年学生报考齐鲁大学的重要材料。该中学是英国浸信会在山东办的主要的中学，比起文会馆的课程，其科学文化知识比例已经大大

的增多了，英国浸礼会的中学一般来说要相对的保守些，守善中学后来坚持不在国民政府注册，甚至还将《圣经》作为必修课程。美国教会办的中学课程要更开放一些。至于齐鲁大学的课程，除了将圣经作为选修课外，在形式上已与一般的大学没有很大的区别了。因此，有人认为教会学校中新学可有可无，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如果我们有兴趣把齐鲁大学的课程与国立大学或者与其它教会大学进行横向或者纵向的比较，也许会使我们对这些大学在这方面的活动有个新的认识。

学校的中心是教师，师资的来源、水平、规范、门类在相当程度上是衡量学校发展与否的标准。齐鲁大学的档案比较完整的保存了关于教师的记录，特别是三十年代的相对稳定时期，对师资的管理记录更为详细。在三十年代出版的文理两院同学名录中，在学校向当局提交的报告中，对当年教师队伍的构成提供了非常具体的描述，这使我们对齐鲁大学的师资，特别是在其他记载中容易忽略的中国教师有充分的了解。把各个时期的教师资料综合起来看，也可以看出师资队伍的变化。这个变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在教员队伍里中国教师在数量上不断增长，在学历水平上不断提高。据1935年的统计，在齐鲁大学文学院的26名教师中，英美和加拿大籍的教师共有8名，仅占总数的1/3还不到。在理学院27名教师中，英美和德国籍的教师只有5人，仅占1/5强。文理学院许多中国籍的教师都有在美国、英国或德国受过教育的背景。据齐鲁大学1940年上报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文件，列举的34名齐鲁大学重要职员中，中国籍的占19名，外国籍的占14名。抗战爆发以后，山东的教会学校大部停办。战后教会学校恢复招生后，外籍教师的数目就更少了。齐鲁大学到四十年代末，除了医学院还有几个外籍教授外，中国教授占了绝大多数。从这个意义上讲，教会学校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在师资方面，经历了从西方传教士教师掌握一切，到以中国知识分子为主的转变过程。仅从师资这方面说，过分强调教会大学的西方背景，忽视教会大学的中国化过程，笼统的把教会大学作为文化上的一种异己力量，也是值得商榷的一个问题。此外，档案及其它资料中还有大量的关于中外教员的宗教、教育、家庭背景及他们个人的经历的丰富记载。值得一提的是，齐鲁大学档案中保存的许多传教士和教职员的信件，其中一些是民国政要和宗教

界的中外名人。如老舍先生在齐鲁大学期间，曾在学生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深入研究这些资料，一定会有有趣的新发现。

如果把学校比作工厂，那么学生在某种意义上也许可以看成是这所工厂的产品。教会大学的学生究竟来自什么样家庭，受过何种教育，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这一直不是说得很明白的问题，在齐鲁大学的档案中，保存了入学学生的履历表、成绩单和志愿书。二、三十年代，报考齐鲁大学的志愿书中有一些需要考生回答的问题，比如学生为什么要考大学，为什么要考齐鲁大学，将来干什么。这些问题虽然过于程式化，但学生的回答也反映了当时的思想实际。同时，学校还要求学生列举读过的书目，这使研究者可以了解到当年学生的知识背景。虽然这些资料内容的充实程度不一，但已经使我们有可能对某个时期，某个专业的学生背景进行一定程度的量化分析，从而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比如，关于齐鲁大学学生的来源，从这些材料来看，出身于教徒家庭的学生确实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但抗战以后，这个比例就有很大的变化。再如读书书目，资料中反映出来与传统印象相反的是宗教书籍并不占很大的分量。二十年代时，许多学生广泛涉猎了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的著作，有不少人还读了鲁迅的《呐喊》、《狂人日记》，有个别的还涉及过关于社会主义的内容。无论这些人后来走上什么样的道路，这些资料至少说明了教会学校建立在中国的国土上，教会学校的学生并不是也不可能孤立和封闭于社会之外，只是被动消极地成为“文化侵略”的对象，近代中国社会的急风暴雨，民族的危亡，革命思潮的激荡必然会对学生产生影响。

在关于学生的材料中，还有一些学生编辑的刊物、学校当局对学生学习和生活各方面的记录、学校就某一方面如学生的职业和在校学生的宗教活动所作的调查报告，所有这些材料展示了学校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些还显示了看来矛盾，却值得进一步深究的问题。如在四十年代末，学校的报告强调学生中宗教生活的削弱，这也许是事实，但是在已发现的学生申请入学的英文自传中，却突出的强调了家庭和个人的宗教背景与宗教经验。这是一种虔诚还是一种实用主义？或者二者兼而有之，值得探讨。研究这些学生的材料，必然帮助我们比较实际的而不是抽象地了解这些青年学生，进而对教会学校的功能有比

较全面的看法。

齐鲁大学各个时期的历史文件也是研究在华基督教事业,特别是山东基督教活动的重要资料之一。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经曲折,由于种种原因,教会材料在国内妥善保存下来的并不多见,有的几乎是荡然无存,对国内学者研究这段历史造成了很大的不便。齐鲁的资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弥补了这个问题。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华北基督教教育协会、山东基督教教育协会、华洋义赈会的文件及与齐鲁大学往来的函件提供了当时这些组织的活动情况。齐鲁大学三个学院,大学医院及广智院的报告中也记载了教会组织的传教活动。齐鲁大学的刊物如“鲁铎”等(学术刊物除外),对教会活动都有详细的报道。长老会山东分会的年会记录、长老会济南教区的报告则具体的反映了这个差会在山东的活动,是非常有用的参考材料。遗憾的是这类报告比较少,除了美国长老会、中华循道公会外,关于其它差会只有一些涉及学校人事与财政的杂件。

除了上述这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外,齐鲁大学的资料还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况。

例如,国内的研究者通常比较关心教会大学的外籍教员对中国政治的态度,对齐鲁大学的研究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可能传教士也有诸多的顾忌,在许多公开发表的材料中很少有这样的内容。只有在保留下来的私人的通信中透露出他们的真实想法。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齐鲁大学的全体学生发表了《为力争青岛敬告全国各界书》,积极参加了游行示威,要求收回青岛,维护主权。教会大学当局的态度如何?历来的研究一直认为大学当局反对学生的活动,实际上不完全如此。档案中保留的日本在山东的报纸五月九日就刊登名为“山东教会大学的残忍和现代基督教会的腐败”一文,激烈的抨击山东的英美教会,日本的报纸指责英美传教士是山东这次反日运动的“主谋”。日本驻济南领事以及自办的青岛日报、济南时报攻击英美传教士在宗教的掩护下从事政治活动,煽动学生,反对日本。日人的指责虽然言过其词但并非无中生有,实际上档案材料也反映了英美教会人士对日本在华扩张,威胁到英美在华利益,持反对态度。当时美国的《独立周报》,曾经就日本在山东的情况向老资格的传教士赛保罗(CAS-SAT)约稿,赛表面上以传教士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为理由,加以婉拒。但是赛写信向该报推荐了《密勒氏评论报》揭露日本在华走私毒品等文章,并且请《独立周报》不要刊登他的名字,以免招来日本人的攻击。在另一位传教士写的一篇“日本人歌颂马将军在济南的残暴行为”文中也抨击日本人的侵略行为。可见,仅依据教会大学当局的某些表面的方针作出判断是不够的,这些资料同后人写的回忆文章互相印证和对比,为我们深入了解当时传教士的真实态度及这种倾向对学生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线索。

再如,齐鲁大学在哈佛燕京社的资助下曾经建立过一个国学研究所,该所自1930年成立到1952年结束,是齐鲁大学文学院中一个重要的学术机构,但是在解放以后很少为人道及,这段历史近乎湮没无闻。在齐鲁历史档案中关于国学所的资料比较齐全,每年的年度报告详细记载了国学所研究人员的计划,学术成果及承担的课程。可以看出当时在哈佛燕京社的推动下,齐鲁大学为提高国学研究和教学水平所作出的努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国内对甲骨文的收藏和研究方面,许多重要成果出自齐鲁大学国学所。抗战前后,国内学术界名流中不少在国学所工作过,或者挂名在国学所。前期如老舍、马彦祥、栾调甫等,后期如顾颉刚、钱穆、胡福林、吕思勉、丁山、张维华等都曾列名国学所。其中顾颉刚等人的书信保存完好。几任研究所主任的报告中则反映了齐鲁大学的领导层对国学所发展方向的不同看法及国学所内部的分歧。这些都是研究这一时期学术史有用的材料,也可以反应出哈佛燕京社的活动对中国国学研究的作用。

从1948年济南解放到1952年院系调整,齐鲁大学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以前由于材料的缺乏,这一段是教会大学历史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新开放的资料对探讨这一时期的历史有特别的意义,其中不仅包括了教会大学自身的材料,还包括了涉及到教会大学的其他方面的档案,对很多问题诸如:建国以后齐鲁大学人事更迭及其原因、师生对新政权的看法、新政权对教会大学进行的分析及采取的政策、齐鲁大学学生与当时华东大学学生冲突的原因与结果、思想改造时期教会大学的情况等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使我们有可能就这个时期齐鲁大学的情况进行新的探讨。

〔责任编辑 黄新宪〕